

# 革命思想的回流

##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法國的傳播

● 高嘉懿

**摘要：**法國的革命文化曾對中國近現代革命產生重要影響。新中國成立後，又出現中國革命思想對法國的回流現象。本文指出，從戰後兩大陣營對抗到中法建交的冷戰國際格局的嬗變中，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法國的傳播經歷了不同階段：法國共產黨為宣揚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普世性而介紹中國革命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就；親華左派希望借中國的馬列主義理論與實踐經驗解決自身的困惑；而毛主義者更是從中解讀出具有廣泛意義的反權威精神來號召民主與人權。中國革命思想之所以能對法國社會產生影響，一是與國際局勢變動和中法關係轉變有關；二是順應了戰後法國知識界與文化界高漲的左翼傾向，並契合了有關去殖民化、第三世界、反霸權主義等時代主題；三是經過法國傳播者的解讀與想像，中國被有意塑造為理想的社會主義烏托邦，符合法國革命傳統中對平等主義的追求。儘管法中兩國政治制度與社會發展階段都不相同，中國的革命魅力卻吸引着法國左翼。

**關鍵詞：**中國革命 中法關係 冷戰宣傳 毛主義運動 馬克思主義

作為大革命故鄉，法國對於自由、平等與博愛孜孜不斷的追求曾經在世界範圍內引發了勢不可擋的政治民主化浪潮，激起了他國對革命模式的學習。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處於革命思想啟蒙時代的中國知識精英也受到法國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精神感召去追求共和與民主，確立了中國對革命文化的崇拜<sup>①</sup>。1920年代初，中國新一代的青年學子遠赴法國勤工儉學，一邊學習馬克思主義，一邊進入工廠實踐，隨即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為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培養和輸送了一批重要的生力軍。可以說，法國的革命文化持續地對中國近現代的革命造成影響<sup>②</sup>。值得注意的是，隨着馬克思主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法國外交部藏中法關係檔案整理與研究（1944-1986）」（批准號：23VLS023）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義的中國化和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反過來對法國產生了思想回流，在1960、70年代出現了一批崇尚中國革命路線、希望借助毛澤東思想來解決自身社會問題的左翼政治文化人士。隨着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的爆發，使得毛主義運動更為引人關注。

1960、70年代法國的毛主義運動是信仰毛澤東思想的馬列主義者領導的一場政治與文化運動。法國學者布爾塞耶(Christophe Bourseiller)的《毛主義者：法國紅衛兵的瘋狂史》(*Les maoïstes: la folle histoire des gardes rouges français*)系統和全面介紹了毛主義運動的發展情況；烏爾芒(François Hourmant)的《法國毛主義的那些年：68年五月前後》(*Les Années Mao en France: Avant, pendant et après mai 68*)同樣聚焦於「五月風暴」前後的毛主義者對於中國革命思想的學習與實踐，但更強調法國自身易受外界革命刺激的政治文化特點；美國學者沃林(Richard Wolin)的《東風：法國知識份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則主要闡述了法國左翼知識份子與毛主義的關係，重點放在「五月風暴」之後法國政治文化的變化情況<sup>③</sup>。這些著作相似的觀點在於，均認為法國社會對於中國的現實情況並不了解，對於中國的革命思想和理論模式存在誤解，幻想着用中國的方法去解決法國的社會問題。關於「五月風暴」、毛主義者與文化大革命的聯繫，國內學者也有一些研究成果<sup>④</sup>。這些成果雖然都提到中國革命思想與「五月風暴」和毛主義運動之間的關係，但沒有論述中國革命思想如何在冷戰背景下於法國傳播、傳播者的目的是甚麼，以及為何到60年代中後期才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

總的來說，法國出現毛主義運動的現象並非一蹴而就，已有研究未能釐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革命思想在法國的宣傳進程。更關鍵的問題在於，這一歷程正值冷戰意識形態和兩大陣營互相對峙之際，不同的行為體究竟是抱以何種目的來宣傳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經驗的？這一傳播進程與冷戰國際關係的風雲變幻、二戰後法國的政治文化傾向之間又存在着怎樣的聯繫？本文將分為三個部分，依次介紹法國共產黨、親華左派和毛主義者對於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革命意識形態的傳播與解讀，分析其與法國戰後政治文化發展的關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指的是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思想內核的，由中共領導人按照中國的實際國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形成的理論體系與實踐經驗。本文主要指的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一階段，即毛澤東思想<sup>⑤</sup>。

## 一 法共對中國革命的關注與宣傳

### (一) 出於政治目的或履行國際主義原則的宣傳

法國作為身處十九世紀歐洲工人運動中心的國家，有着濃郁的革命文化傳統。隨着1930年代中期建立人民陣線，用暴力手段奪取政權的激進路線已

被法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逐步放棄。二戰結束後，在抵抗運動中獲得聲望的法共根據蘇聯的戰後安排以及法國的實際國情，正式放棄武裝起義，改為走議會道路來漸進式地實現「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然而，法國內部的矛盾並未得到妥善調和。隨着美蘇合作破裂、走向對抗，整個歐洲籠罩在冷戰的陰影下，除東西歐國家之間展開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的較量外，各國內部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利益衝突也不斷加劇。1947年5月，法共因為與共同執政的社會黨、人民共和黨的矛盾頻發，被迫退出了聯合政府。9月，法共加入了蘇聯組建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重新執行激進的階級鬥爭路線，並關注起他國社會主義革命等國際問題<sup>⑥</sup>。在此背景下，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引起了法共的關注。

此前，法共中央忙於國內的新民主建設，對於國際局勢、尤其是非法屬殖民地的亞非國家的命運不太關心，只是從階級立場和國家利益上，零零碎碎地在機關報《人道報》(*L'Humanité*)上報導了一些中國的情況。1947年初，中共中央派往歐洲的聯絡員劉寧一到達巴黎，與法共建立了聯繫。法共總書記多列士(Maurice Thorez)隨即邀請劉寧一在法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介紹中國革命的形勢<sup>⑦</sup>。這體現了法共開始對中國革命產生興趣。

之後，法共中央委派專人負責定期介紹中國內戰局勢，以期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特點與進展。2月，法共對外政策處亞洲事務負責人馬尼安(Marius Magnien)向黨內領導幹部做了兩次關於中國內戰局勢的介紹。他指出中國內戰是在民主與反民主兩大陣營對峙的局勢下產生的，毛澤東的戰略和戰術正在靈活有效地打擊反革命份子；中共的土改政策、愛國民主統一戰線，以及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文化政策給解放區人民帶來了「幸福、自由和民主的生活」<sup>⑧</sup>。馬尼安的話語不僅表露出對中國革命形勢的樂觀，也指明了中國革命與國際社會的關係。他強調中國將建立人民民主專政，這不只是中國人自己的事務，也關係到所有熱愛和平的國家，關係到中國的真正的朋友們<sup>⑨</sup>。

不過，此時法共在公開報刊上對中國的宣傳仍然很少。一直到法共在1947年5月5日退出政府後，《人道報》對中國形勢的報導才一下子增多，並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強調中國國民黨無法應對國內危機的加重，而中國民主軍隊的力量則不斷強大，得到了民眾的支持和響應。如5月6日的報導指出：「事實證明，正如蔣介石的支持者所痛苦地看到的那樣，人民力量『可以抵抗敵人發動的進攻』。我們甚至可以看到，這些人民力量的對手很難抵抗進攻！」<sup>⑩</sup>28日，《人道報》總編加香(Marcel Cachin)撰寫了評論員文章〈蔣介石陷入絕境〉。他將南京國民政府定義為「反民主政府」，而對中共領導的民主力量則稱之為「抵抗者」，表示法國人民要「向毛澤東和陳毅領導的軍隊取得的勝利致敬」<sup>⑪</sup>。詞句的表述不禁讓人聯想起法共在二戰中對貝當(Henri P. Pétain)政府的抵抗以及戰後對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的批判。這種不由自主的共情，在法共被逐出政府後，顯得更加強烈。

二是自1947年夏天開始，特別是9月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成立大會(下稱「九國共產黨會議」)之後，法共將批判美帝國主義列為首要的宣傳任務，

罪名之一就是美國四處干涉世界各地發生的民主革命，特別是採取援蔣反共的政策。《人道報》揭露美國同時干涉希臘革命和中國革命<sup>⑫</sup>，指出美國打壓中國人民的正義戰爭是為了謀取自身的利益，而不顧中國的苦難<sup>⑬</sup>。相對來說，從1947年秋到1948年上半年，《人道報》雖然沒有停止對中共的軍事行動和解放區的情況進行簡單報導，但更為關切的是對歐洲局勢影響更大的希臘革命。

三是隨着1948年秋希臘革命形勢不斷惡化而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國民黨軍隊發起戰略決戰，法共對於中國內戰的關注度空前加大，並愈來愈突出對中國革命的世界性意義的宣傳。根據筆者粗略統計，《人道報》在1948年5月報導希臘內戰的日數為十四天，而涉及中國內戰的報導僅有一天。而同年11月，有二十三天報導了中國內戰形勢，報導希臘內戰僅有六天<sup>⑭</sup>。

1948年10月20日，當解放軍已向國民黨軍隊發起了戰略決戰，馬尼安在黨內做了有關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道路的報告，着重介紹了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指出這一路線值得有類似國情的受壓迫民族借鑒。他強調，儘管中國革命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能激發亞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鬥爭，但同時也「加強了歐美人民抵抗美帝國主義反動行為的鬥爭」。他宣稱「在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和歐洲七國建立人民民主國家以來，中共在1948年的勝利是當前世界的關鍵事件」<sup>⑮</sup>。與前述1947年的報告相比，馬尼安此次明顯強調了中國革命對於抵抗美帝國主義擴張的作用。

除了黨內關於中國革命的研討和學習外，法共的宣傳機構也開始發力，持續跟進中國內戰局勢的發展動態，力圖讓法國民眾了解中國問題與法國自身以及歐洲局勢的關聯。《人道報》國際專欄的負責人庫爾塔德(Pierre Courtade)頗具洞察力地意識到，中國局勢的發展對於戰後亞洲格局的演變將帶來重要影響，冷戰從歐洲向亞洲蔓延的趨勢已經出現。他在1948年9月4日的文章中提醒讀者要關注亞非革命，不能只顧關心歐洲事務，要聯繫世界總體局勢，才會清楚帝國主義的力量在退卻，才能更好地理解歐洲對峙下的強弱比較<sup>⑯</sup>。他在11月1日的另一篇文章中指出華盛頓已盛行「中國丟失論」，從而把主要精力轉移到日本身上，就同美國在歐洲重建德國一樣。對此，庫爾塔德強調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中國民主軍隊的推進可能迫使美帝國主義不僅在亞洲徹底改變他們的政策，而且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在歐洲也作出調整」，「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人民的勝利是各國人民爭取獨立的勝利。……這是和平的偉大勝利」<sup>⑰</sup>。

與此同時，法共的宣傳將中國革命的勝利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優勢上揚聯繫在一起。1948年11月16日法共中央委員會發表決議，認為目前的形勢再次肯定了1947年9月九國共產黨會議上的觀點，即帝國主義陣營和民主陣營的鬥爭「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不斷尖銳、資本主義力量減弱、社會主義民主力量加強的條件下進行的」。他們特別提到解放軍歷史性的勝利來證明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上漲<sup>⑱</sup>。

1949年6月底，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公開宣告新中國向蘇聯陣營「一邊倒」後，法共秘書處在8月2日會議決議中正式指明了新中國的陣



營歸屬：「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是與蘇聯領導的反帝陣營站在一起的，是維護和平、威震帝國主義陣營的重要力量。」<sup>①9</sup>可以說，法共中央對中國革命的認知發生了關鍵性轉變：之前在宣傳中國局勢發展時，法共尚不怎麼突出中共的角色，更多是以中國民主力量為宣傳對象，強調的觀點是中國內戰意味着美國在全球勢力擴張的失敗，認為中國革命主要對亞洲解放有借鑒意義；而此時，隨着中共中央宣布「一邊倒」，那麼新中國的建立就意味着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力量的強大和勝利，從而也與法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密切聯繫在一起。

因此，法共對於新中國的成立表示歡欣鼓舞，多列士要求黨內的宣傳機構向民眾廣泛介紹中國革命以及新中國的情況，希望借中共的勝利之勢來鼓舞法共黨員，增加法共的社會威望，展現社會主義力量在國際上的發展<sup>②0</sup>。除《人道報》以外，法共的《新民主》(*Démocratie Nouvelle*)、《共產主義手冊》(*Cahier du Communisme*)等刊物也開始對中國革命做大量宣傳：

一是對毛澤東發表的有關新中國政治制度和外交方針等講話及文章的轉載。例如1949年7月21日《人道報》對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進行全文轉載，並提示「中央委員會通知全黨各支部於下一次集會上學習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sup>②1</sup>

二是介紹中國革命與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密切聯繫。1949年7月2日，《人道報》刊登了毛澤東在中共建黨二十八周年紀念日上的講話，強調「中國只會從蘇聯那裏得到真正友好的幫助，等待美國、英國和其他帝國主義的援助是幼稚的」<sup>②2</sup>。法共知識份子黨員科尼奧(Georges Cogniot)發表在1950年6月《新民主》新中國特刊的一篇文章也指出，中共走向勝利的革命路線來自於斯大林的指導，他們採取了「列寧和斯大林關於帝國主義時代民族主義與殖民地革命」的理論方針<sup>②3</sup>。

三是指出中國革命的勝利對亞太地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反帝反殖民主義鬥爭的作用。《人道報》的評論文章指出法國在印度支那進行的「醜陋的戰爭」已不僅僅是法越之間的事情，一方面法國駐印度支那當局和遠征軍已經與國民黨的殘兵敗將勾結在一起，成為了亞洲革命的破壞者，另一方面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將與胡志明領導的越南結成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共同陣線<sup>②4</sup>。這代表了印度支那問題在法共眼裏不再僅僅是殖民地解放問題，而是兩個陣營之間的鬥爭了。

四是強調法國民眾應該熱心關注和扶持中國新民主事業的發展，採用交流、合作、鼓舞的方式，擴大與新中國人民的接觸與了解。1949年3、4月間，《人道報》集中介紹了中國解放區群眾運動的高漲，特別指出新時代下中國婦女地位的提升<sup>②5</sup>。該報還頗為激動地報導新中國將派代表參加4月20日在巴黎舉行的世界保衛和平大會：「民主中國的人民將出現於4月20日的巴黎。」<sup>②6</sup>

解讀法共的宣傳可以發現，他們關注和聲援中國革命事業，不僅是出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原則，更多地是與被逐出政府後成為反對黨的法共自身的國內外鬥爭任務相掛鉤。捲入冷戰、改變路線後法共，意識到符合其理想的法

蘭西新民主建設已被迫擱置，因而一半是出於政治任務，一半也是不由自主地關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及新中國的建設，產生了一定的「移情」心理。

新中國成立後，法共發動黨員和群眾去了解中國革命和新中國恢復政治社會秩序、開展經濟文化建設的情況。此前，由於法國政府不願發簽證使得中國代表未能參加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為了彌補遺憾和表示對新中國的支持，世界工會聯合會 (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和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 (Women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決定於 1949 年底在北京召開亞洲代表會議。因此，世工聯總書記賽揚 (Louis Saillant) 和國際民主婦聯書記瓦揚-古久里 (Marie-Claude Vaillant-Couturier) 夫人，以及多列士的夫人維美徐 (Jeannette Vermeersch) 等人赴華參會，成為了首批到訪新中國的法國人<sup>②7</sup>。

他們歸國後熱情地抒寫了關於新中國的情況。從 1950 年 1 月 29 日到 2 月 6 日，《人道報》連續發表了維美徐的長篇報導〈發現新中國〉，向法國民眾描繪了一幅新中國圖卷。她首先敘述了在東北看到的農民形象：貧困、質樸、勤勞的勞動人民，居住的房子很破落，農業生產只依靠人力以及耙、犁這樣的基礎工具。但隨即畫筆一轉，強調當前「中國農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為對農民來說最重要的土地，曾屬於封建地主，「但現在起，中國人民為之流血的土地將屬於耕種它的人」，「這是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決定」<sup>②8</sup>。隨後，她依次介紹了新中國的工人、知識份子、婦女，以及新的內政外交政策，並利用對比的方法，突顯了各階層民眾生活的變化；「破舊革新」、「前進」、「光明」、「自由」、「希望」等詞成為了關鍵詞，在文章中不斷重現<sup>②9</sup>。這體現了法共人士自身的階級情感和崇拜革新的意識形態。

馬尼安對新中國的長篇報導更突顯了法共的階級立場與情感。他於 1950 年秋被法共中央派到中國進行社會調研工作。與維美徐一樣，他也聚焦於工人、農民階層生活水平的提升：「我到處見這些中國工人說：『日子比過去好多了』，『正是黨帶領他們在自由中過上更好的生活。』」<sup>③0</sup>不過，他對中國的階級鬥爭政策進行了更為詳細的介紹：「改革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封建地主盡一切努力想要延緩他們作為地方統治者對廣大農奴的控制權的喪失。這個封建階級必須被消滅。為此，有必要將他們與暫時不會接觸的富農隔離開來。」<sup>③1</sup>馬尼安強烈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還反映在他對新中國塑造「新人」政策的介紹。他解釋了經受革命洗禮的士兵和青年人能夠透過思想政治教育塑造高尚精神品格：「『為人民服務』、『再教育』這些詞語，在當今中國到處可見」，「新民主主義政權通過它的正義政策，通過它的經濟工作和它聯合全國所有民主階層的共同綱領，對那些遠離共產主義、麻木不仁的人進行了再教育」，只有經歷再教育的改造，資產階級、民族資本家才會對國家的獨立發展、祖國的根本利益與重建自由感興趣<sup>③2</sup>。

這些報導體現了法共對於「革命」、「新生」這些意識形態詞彙和理念的擁護和嚮往，也向法國民眾傳遞了新中國與舊日停滯的東方帝國不一樣的革命形象，闡述了新中國將給中國人民乃至亞洲和全世界帶來的革新與希望的氣息。不過，法共認為中共的革命理論以及新中國的建設道路對於法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借鑒意義不大，強調的是中國道路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引領作用。

## (二) 中共革命理論對法共的借鑒意義

然而，1956年蘇共二十大之後，法共開始認識到中國的理論思想對於解決自身困難也有幫助，相關的宣傳進入高潮階段。原因在於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秘密報告」洩露後，資產階級政黨及報刊藉此攻擊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同時，法共黨內也一石激起千層浪，不少黨員感到震驚迷惑，法共中央的威信受到嚴重影響。當法共受到內外夾擊、需要尋求理論解釋時，中共方面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給了法共中央很大幫助，平息了黨員對理論路線的異議<sup>③</sup>。

事態剛有緩和，不久又發生了蘇聯出兵干涉匈牙利的事件，激起了法國社會反蘇反共情緒，爆發了一次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甚至法共黨內也有人對蘇軍的行為表示憤慨並要求脫黨。危局之下，中共中央12月29日發表的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一次為法共中央解難。30日，《人道報》以大篇幅轉引該文，並指出「斯大林的錯誤並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為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制度。西方資產階級想用斯大林的錯誤來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誤』，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sup>④</sup>。

中共的理論解釋對於法共平息內部爭論起到了較好的效果，從而提升了中共在法共中央和基層黨員心中的地位，尤其是增加了左翼知識份子對於中國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的認識。馬尼安在拜訪中國駐瑞士大使時心懷感激地表示，中共的理論文章對法共幫助很大，「這些問題由中國黨來講很好，中共是根據馬列主義學說原則，但走的是中國自己的道路，而且目前這些話蘇共來講又會被說成是下命令了」<sup>⑤</sup>。

與此同時，中國展現的新興社會主義國家的形象，也有助於彌補蘇聯形象受損後社會主義的聲望。1956年10月3日，代表法共參加中共八大會議的對外政策負責人居約(Raymond Guyot)對法共黨員介紹了會議的情況，指出「通過中國革命可以看到，最基本的問題在於掌握政治權力，由共產黨領導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大多數人民的意志，聯合其他勞動階層來建設社會主義，並鞏固政權」<sup>⑥</sup>。法共中央還將中共八大的主要文件譯成法文出版，號召全黨將八大提出的中心問題結合蘇新國家(蘇聯和東歐的新人民民主國家)多年來的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從理論原則上進行學習，以提高政治水平和改進工作<sup>⑦</sup>。

此後，法共對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賦予更多關注，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進行廣泛宣傳。整個1958年，《人道報》不斷報導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建設，盛讚中國在農業和工業領域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實現了「大躍進」。例如9月3日的一篇文章介紹正如火如荼開展的人民公社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快速擴大。中共政治局在學習經驗後，估計『人民公社是加快建設社會主義和走向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最好形式。人民公社將是建立在共產主義社會基礎上的社會單位。』」<sup>⑧</sup>

法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褒獎，當然不完全是中國的實際情況，他們的駐華記者很難進行實地考察，更多是轉引中國報刊上的宣傳論調。但法共

其實也不在意是否為誇大之言，其宣傳目的在於強調中國建設的成效顯著、能快速追趕上發達的工業國家，以突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指出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家也能通過趕超工業化階段進行現代化改造，給法國民眾塑造一個新興的社會主義大國形象。

總之，法共宣傳和學習中國革命思想與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原因有三點：第一，美蘇對抗加強了法共對於社會主義陣營新興力量的關注。法共認識到，新中國的成立不僅壯大了蘇聯陣營的實力，也能夠證明蘇聯對於落後民族的關心和扶持，而支持蔣介石的美帝國主義勢力則受到嚴重打擊。無論出於國際主義的責任與情感還是國際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法共都有必要宣揚新中國的作用和地位，以及中國實踐馬克思主義的經驗。

第二，法共認為中國的革命道路是依據國情實踐的，適合具有類似國情的亞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學習。雖然中共的路線與法共自身的發展道路存在差異：法共是走議會道路的，且中法兩國的社會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國內國際環境都不同；但是，宣揚中共的路線與理論有助於展現社會主義的普世價值。

第三，蘇共二十大之後，法共需要在路線上跟隨蘇聯改弦易轍，但思想觀念上卻存在慣性，加上遭受國內反共勢力的攻擊，處於內外交困的局面。法共中央力圖借助中共的理論文章向黨內做出解釋和緩解困境。中國人民通過社會主義改造路線快速發展經濟、提升國力的願景，有助於消滅法國左翼民眾對蘇聯體制的失望，塑造新中國積極奮進的形象來證明社會主義道路的優越性。

## 二 中法建交背景下的宣傳變動

### （一）中法的相互宣傳與蘇聯因素

中共歷來重視宣傳戰線的工作。新中國建立後，對外宣傳成為中國公共外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向世界人民介紹新中國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取得的建設成就，擴大自身的國際影響力，外文出版社創辦了多份多語種的刊物，如《人民中國》、《中國建設》、《北京周報》等，並翻譯出版了一批經典著作如《毛澤東選集》<sup>③</sup>。然而，鑒於多方面的原因，諸如缺少語言專家、交通運輸不易、官方審查制度等，中國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書刊傳播工作進展得並不如意。

中國對法國的宣傳活動到1950年代後期才有起色，主要原因在於1954年《日內瓦協定》(Geneva Agreement)簽署後，中法兩國關係開始緩和。待到1956年法國社會黨主政後，法國對華政策明顯有所鬆動。議會內要求承認中國的呼聲不斷加大<sup>④</sup>，政經文教各界對中國的興趣也在提升，不乏知名人士主動赴中國駐瑞士大使館了解情況，甚至提出訪華的要求。《世界報》



(*Le Monde*)、《快報》(*L'Express*)等中左派報刊，對中國開始有了較為正面的評價，認為中共政府在生產建設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呼籲政府盡快承認中國<sup>④1</sup>。在此背景下，法國政府對於引入中國書刊的態度開始緩和，1957年允許新華社在巴黎開設分社。同時中國也加大了對法國的宣傳力度，1958年《人民中國》、《中國建設》等外宣刊物都加設了法語版，北京電台也開始推出法語廣播，以向法國人民介紹新中國在諸多領域取得的建設成就以及擴大國際影響力。

在對法宣傳中，中國有意與當地社會團體進行合作。法共及其領導的「法中友好協會」自然成為中國首要合作夥伴：法共派遣相關專家赴華幫助進行法語的翻譯和教學工作；受中國委託在所屬或所管理的書店、報社代售和郵寄各類中國書刊；雙方還在多文化領域開展交流合作，如1958年法中合拍的兒童電影《風箏》(*Le Cerf-volant du bout du monde*)。因此，在1950年代，法共不僅主動宣傳新中國，也在中國對法人民外交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然而，1960年中蘇兩黨公開意識形態論戰後，法共中央儘管在部分問題上贊同中共的觀點（如對斯大林的态度），但難以擺脫遵循蘇聯指示的思維慣性，在一些根本性問題上與中方認識不一致（如走議會道路還是革命道路的問題）。因此，在蘇共二十二大以後，法共中央有意減少對中國理論路線和觀點的宣傳。1961年12月5日法共秘書處決議：「不接受關於散發《人民中國》雜誌的提議。對於《中國》雜誌，也不再散發，但是可以買一百份左右。對中國書籍，則不能發售違背八十一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聲明內容的書。關於《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需要在組織售賣前審核其中的內容。」<sup>④2</sup>同時，《人道報》等報刊開始批駁中共的論戰觀點，只單方面轉載蘇共《真理報》(*Pravda*)的文章，而不刊登中共的理論文章<sup>④3</sup>。這與此前對中共理論的宣傳可謂天壤之別，自然引起了部分法共黨員的不滿。他們認為不能片面地了解情況，起碼看到中國的文章後才能批判。從1962年起，這些黨員主動致信或拜訪中國駐瑞士大使館和新華社巴黎分社，希望能得到中共的宣傳材料，聽取中方對自身政策和立場的說明，接受並轉發中國的宣傳材料<sup>④4</sup>。

鑒於法共在西歐共產黨中的重要地位，中國對於爭取法共內部左派力量的工作頗為重視。中國駐瑞士大使館人員和新華社記者專門與來訪的法共黨員和與華友好人士進行談話，向他們介紹中國的政策和立場，分發宣傳材料，並了解法共內部情況<sup>④5</sup>。從談話中，中方獲悉法共黨內對於中蘇政策分歧的看法，知曉一些基層黨員和部分幹部對於法共中央政策的異議，因而希望爭取將這些左派份子團結起來，壯大法共內部的左派勢力<sup>④6</sup>。為了扶持法共、意大利共產黨等西歐共產黨內部的親華左派，中國駐瑞士大使館在1963年9月15日還制定了具體的工作方針，認為「考慮到今後國際共運中反修鬥爭的需要，為進一步做好西歐左派工作，促進馬列主義隊伍進一步發展，必須根據中央鞏固和發展左派，教育和爭取中間派，打擊和孤立右派的總方針積極而穩妥地進行工作。大力宣傳我黨觀點揭露修正主義，耐心在廣大的中間份子中進行工作，擴大左派力量」<sup>④7</sup>。

## (二) 法共黨內的親華左派

在中國駐外機構的聯絡、溝通與扶持下，法共黨內聚集了一股親華派勢力，思想上進一步與中共靠攏，紛紛自主建立了學習小組或文化協會，以結合自身情況重新學習和解讀馬列主義。這些親華左派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支持正統馬列主義觀點、反對去斯大林化的老黨員，認為法共不應該丟掉鬥爭武器而一味地走和平道路，代表人物是馬爾梯 (François Marty) ④；第二類是反對殖民主義和關注第三世界發展的共產黨人，特別是一些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積極份子，比如儒爾蓋 (Jacques Jurquet) ⑤；第三類是黨內的一些知識份子，由於蘇共秘密報告和「波匈事件」嚴重損害了蘇聯的形象，在貝熱隆 (Régis Bergeron) 等人的眼中⑥，蘇聯已失去吸引力，而中國煥發出生命力，因此他們將目光投向中國，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模式產生興趣。

親華左派成為了中國書刊在法國傳播的新合作對象。1963年6月，新華社巴黎分社通知了法國的幾所大學，中方不會再通過受「法修」領導的法中友好協會進行文化教育交流活動⑦。之後，中國人民外交學會開始邀請親華派改組的法中友好協會馬賽分會主席和秘書訪華，他們在北京期間還受到中國外交部長陳毅的接見⑧。在中方的資助下，1964年新組的法中友好協會還在波爾多成立了一家文化宣傳機構「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著作與期刊」，負責在法國西南地區經銷中國的期刊及書籍⑨。一些左派人士開設的書店也專門售賣中國書刊，如貝熱隆在巴黎開辦的鳳凰書店 (Librairie Le Phénix)，很快成為一家頗負盛名的華文書店，吸引了不少左翼知識份子來購買毛澤東著作和語錄。

這些左派人士之所以站在中國一方，關鍵是中國所樹立的國際形象與戰後法國左翼所關注的時代主題相契合：第三世界問題、支持去殖民化、反對大國霸權主義，這種國際平等主義的追求深深打動了這些馬克思主義者的心靈。與之前法共出於國際主義和政治鬥爭目的而做的宣傳相比，他們對於中共理論思想的學習與傳播更為真誠，認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能給法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帶來啟示和幫助。

當1964年1月27日中法聯合公報宣布兩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後，這些親華左派人士隨即召開了特別會議。儒爾蓋興奮地稱，法國承認中國後，「中國的孤立被打破了」，修正主義者的謊言破滅了，並指出法國承認中國促進了和平，此事件也可以成為促使國際共運重新團結統一的契機⑩。2月15和16日，四個地區 (巴黎克里希、巴黎拉丁區、佩皮尼昂和馬賽) 的馬列主義小組聚集一堂，商討如何趁中法建交之際，擴大對中國的正面宣傳，如播放中國電影、分發雜誌書籍等⑪。

不過，中法建交初期，中國書刊在法國的傳播力度仍然很小，據法國政府的統計，從1964年2月到12月，中國書刊的郵寄和發售情況是：(1) 40本《列寧主義與現代修正主義》從中國郵寄到法國北部的里爾；(2) 4,000本法文版的政經月刊《中國》第三期，經瑞士洛桑發往法國各地；(3) 100本從北京直接寄到法國北部阿拉斯的《北京消息》第十期。負責銷售這些期刊的書店，主

要是巴黎左岸拉丁區和蒙巴納斯的幾家國際書店和外文書店，以及在馬賽和里爾的兩家書店<sup>⑤</sup>。

### (三) 中國書刊在法國的快速傳播

中國書刊在法國傳播的快速發展階段是在1965至1966年。一方面，由於中國國內局勢變動，路線轉向極左，號召支援世界革命，因此對外整體的宣傳力度加大。到1965年底，中國對外宣傳的印刷媒介已有四十種，發行範圍涉及159個國家和地區，在國外建有二十七個出版發行據點；對外廣播也在1965年達到高峰，聽眾來信達28.6萬封，來自135個國家和地區，是1951年的440倍<sup>⑥</sup>。由於法國在國際鬥爭中的重要作用（法美矛盾）以及法共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法國成為中國對歐的主要宣傳陣地。中國還協助法國各地的馬列主義小組聯合起來，於1964年7月成立「法國馬列主義小組聯合會」。1965年初，該聯合會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選出了領導機構和通過〈法國馬列主義綱領草案〉，並決定創辦《新人道報》（*L'Humanité nouvelle*）<sup>⑦</sup>。

1966年6月25日，受中國文革爆發的影響，法國馬列主義小組聯合會改名為「法國共產主義運動（馬列主義）」（下稱「法共（馬列）」）。成員將自己視為法國工人運動的繼承者和共產主義的代表，號召與法共那些修正主義者作鬥爭。他們致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熱烈讚揚毛澤東思想在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鬥爭中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sup>⑧</sup>。很快，法共（馬列）的成員投入到對文革的宣傳中，並積極展開了對毛澤東思想的學習。他們的機關報《新人道報》發表題為〈文化大革命萬歲〉的文章，讚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過程中的新階段，是文化的大躍進。它對全世界所有的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有巨大的教育意義」；提出法國馬列主義者應該「科學地分析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並從中吸取對我們鬥爭的各種教益」，「我們應該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我國的資產階級展開不調和的鬥爭，這種鬥爭同在我們隊伍內部進行的意識形態鬥爭是分不開的」<sup>⑨</sup>。

另一方面，法國政府對於中國宣傳品的態度轉變也對中國革命理論的在法傳播產生推動作用。1964年中法邦交的建立被世人視為突破意識形態、以現實主義態度開展獨立外交政策的典範。法國總統戴高樂在6月19日與中國駐法大使黃鎮會談時表示，法國願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待中國，不強調意識形態因素：「我國可以不在乎中國的宣傳，但不能無視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行動和態度。」<sup>⑩</sup>為了擴大對華友好，戴高樂支持開展兩國文化交流工作，希望能打破法國民眾十多年來對新中國的無知或誤解。1965年7月19日至8月5日，負責文化事務的國務部長馬爾羅（André Malraux）訪華，8月2日他與周恩來總理會談時表示：「我們認為應當加強接觸，首要的事情，同我〔7月〕23日已與陳毅先生所說，不是在外交方面，而是應加強人民之間的關係。先要讓人民互相了解。」<sup>⑪</sup>

在高層的對華方針改變下，法國政府開始放寬對中國宣傳刊物的審查力度。建交伊始，法國內政部向外交部諮詢關於中國期刊的處理意見時，外交

部的答覆還是：「我認為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不意味着要對中國的出版物、雜誌以及宣傳冊採取特殊對待，這些宣傳品可能會擾亂公眾的平靜。」對於中國方面的宣傳活動，「沒必要進行特別的容忍」，「我同你〔內政部〕一樣，對於中國在法國的政治宣傳的發展情況感到擔憂」<sup>⑤</sup>。但從1965年起，外交部的態度明顯鬆動。7月19日，內政部再次詢問外交部：「與北京外交關係正常化後，對於中共報刊該採取怎樣的態度？」<sup>⑥</sup>此次外交部的答覆是建議採取寬鬆政策，認為要對中國書刊在法國發售給予一定的自由。原因在於：一是遵循互惠互利原則，希望放寬中國書刊在法國的傳播，換取中國加大引進法國的書刊；二是中國報刊的宣傳論調雖然含有革命激進思想，但也介紹了中國國情，有利於法國公眾了解中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外交部還改變了憂慮態度，認為不用太擔心中國宣傳品的影響力，因為報刊文章中所反映的中國價值觀和文化習俗與法國的類比性太少，宣揚的觀點吸引不了太多的西方讀者，「所以在目前情況下，不必阻止中國宣傳刊物的發售」<sup>⑦</sup>。根據此項意見，內政部放寬了對中國宣傳刊物的審查，同意引進帶有革命理論的書冊資料。

文革發生後，雖然法國內政部擔憂其將造成不利影響<sup>⑧</sup>，害怕旅法華人組織傳播文革和毛澤東思想<sup>⑨</sup>，要求時刻注意中國對法國的宣傳動態<sup>⑩</sup>，但法國外交部仍以積極樂觀的態度去維護法中關係。他們支持給予在法華人協會合法身份，儘管警察局認為該協會的態度是親共的，應該限制其政治活動，但是外交部從維護法中關係的角度出發，建議採取不同的做法<sup>⑪</sup>。當內政部詢問是否限制中國向馬賽的親華組織散發宣傳冊《越南人民將勝利》之時，外交部的態度是不反對在法國散播中國的講話稿和書刊<sup>⑫</sup>。即使到了1967年中國與各國外交矛盾頻發，外交部也還是給予中國書刊一定的發行自由，認為可以對其中批評美蘇的書刊進行審查，而對於有關毛澤東和中共其他的理論書籍不用限制<sup>⑬</sup>。

可以說，法國政府出於維繫法中關係、增進民眾互相了解的考量而對中國的報刊傳播予以一定的放寬政策，這在某種程度上為毛主義運動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寬鬆的政治輿論環境。

### 三 法國毛主義運動的推動

#### （一）毛主義運動成為政治文化潮流

當法國親華左派聯合發展時，一些左翼知識青年也開始對中國社會主義模式和毛澤東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時亞非拉一連串的革命運動：古巴革命、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北越對抗美國及其傀儡南越的鬥爭，讓一些受到良好教育、出身優渥，又繼承了法蘭西革命情懷，懷有解救第三世界苦難人民等崇高道德理想的熱血青年開始研讀中國的書刊。顯然，中國充滿戰鬥性的革命理論對於青年學生有很大吸引力。主要的親華派學生團體誕生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下稱「巴黎高師」），



這要歸功於該校的哲學教師阿爾都塞 (Louis Althusser) 和他的學生林哈特 (Robert Linhart) ②。後者積極宣揚中共的理論路線，並在巴黎高師組建了毛主義理論學習小組，學習諸如《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講話、中國報刊上的論戰文章等。

1966年6月起，這些學生受到文革的鼓舞，在法共屬下的「共產主義學生聯盟」(下稱「共學聯」)中發起論戰，結果被全部開除出共學聯。但這引起了拉丁區學生的廣泛同情，吸引了不少熱血青年加入。不久，他們聯合其他幾個親華派學生小組，於12月10日建立了「共產主義青年聯盟(馬列主義)」(下稱「共青聯(馬列)」)。他們在成立大會上譴責法共和共學聯的修正主義者，宣布堅決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和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代表大會選出了領導機構，並決定出版刊物《紅衛兵》(*Garde Rouge*)和《馬列主義手冊》(*Cahiers marxistes-léninistes*)。

雖然共青聯(馬列)的成員並不多，以林哈特為首的核心領導人11名，普通成員僅95名，另外還有300名同情者，但這個組織匯集了一些非常聰慧、眼界開闊又關注時事的精英學生③。從家庭背景來看，大部分學生的出身都非工人階級，反而來自資產階級或富裕家庭。因此，他們不被視為正統的馬列主義者，只是一些受到毛澤東思想和文革那些令人激動不已的口號影響的年輕人，而被稱為「毛主義者」。他們以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口號為目標，開始到法國各地的工廠和農村工作和實地調研，與工人聯誼，有些還到中國和阿爾巴尼亞學習革命經驗。1967年9月，林哈特等毛主義青年領袖從中國旅行歸來後，隨即在巴黎高師展開了「整風運動」，要求發動一場「插入運動」，號召毛主義學生放棄學業到工廠工作，與工人階級實際接觸，實行毛澤東有關知識份子必須與群眾相結合的理論實踐④。他們試圖用體力勞動去彌補與勞動階級在出身地位、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差距，用自我奉獻的精神達到一種神化的道德狀態。這成為法國毛主義者特有的一場實踐行動⑤。

毛主義運動很快成為法國社會的一股政治文化潮流，很大程度上源於法國各大報刊對於文革的熱議。它們一方面批評紅衛兵給中國社會帶來麻煩、失控、暴力衝突等負面情況，另一方面也傳遞了紅衛兵的怪異形象：頭戴綠色帽子，手裏拿着「紅寶書」，胳膊上還戴着紅袖章，高聲朗讀或歌唱《毛主席語錄》。對於法國民眾而言，這無疑是新奇有趣的裝扮。尤其是對那些倡導非主流文化的年輕人來說，毛主義元素成為了一種標新立異的時尚文化標誌。巴黎街頭開始出現穿中山裝的法國人。男士時尚雜誌《他》(*Lui*)第四十二期(1967年6月)專門對中國的文革鏡像做了介紹，教人如何打扮成一位「親華份子」，穿中山裝、攜紅寶書、模仿文革的鬥爭造型⑥。法國新浪潮電影的奠基人戈達爾(Jean-Luc Godard)在1967年拍攝的電影《中國姑娘》(*La Chinoise*)中，講述了毛主義者背誦法文版《毛澤東語錄》、學習馬列主義教義、批判美帝國主義的日常活動。這也展現了毛主義運動已成為法國年輕人欣賞的小眾文化潮流。

隨著毛主義運動的發展，法國報刊輿論對文革的誤讀也愈來愈普遍。如果說1966年8月到1967年1月的法國報刊上還有不少對文革的批判文章，到

了1967年春夏，法國報刊（尤其是《世界報》）對於文革的評價卻愈來愈積極。7月《世界報》專題介紹毛主義運動的發展，並給予正面評價<sup>⑦</sup>。蘇聯十月革命勝利五十周年來臨之際，該報又接連兩天刊登了法共（馬列）成員巴比（Jean Baby）的長篇文章〈為文化大革命辯護和揚名〉<sup>⑧</sup>。

## （二）毛派小團體與左翼知識份子

1968年的「五月風暴」促發了法國毛主義運動進入世人的眼簾。事實上，自譽為馬列主義者（信奉馬列主義的法國左派、原法共黨員）的共青聯（馬列）和法共（馬列），起初並未參與這場被視為「資產階級學生」發起的運動，這主要是由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洛茨基派學生組織領導的。直到後期，毛主義者才開始加入並進入工廠進行罷工動員，促成了工人和學生的聯合。總體上，他們的作用並不突出。但法國總理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6月12日宣布取締極端組織時，共青聯（馬列）和法共（馬列）也位列其中。法國內政部還援引6月12日禁令，限制含有危害法國社會安定的無政府主義或極端革命思想的外國刊物入境法國，中國的《中國》、《中國建設》等期刊也被禁止散發<sup>⑨</sup>。

不過，政府的打擊和控制反而激起了毛主義運動的壯大。一些毛派小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如「無產階級左翼」（Gauche prolétarienne）、「革命萬歲」（Vive la Révolution）、「紅色戰線」（Ligne Rouge）等。其中，最為著名的「無產階級左翼」成立於1968年9月，自詡繼承了「五月風暴」運動的遺志，不少是原來共青聯（馬列）的成員。該組織的領導人萊維（Benny Lévy）便是前共青聯（馬列）學生領袖之一，他和勒當泰克（Jean-Pierre Le Dantec）等人辦了一份宣傳毛主義的報刊《人民事業報》（*La Cause du Peuple*），作為「無產階級左翼」的機關報<sup>⑩</sup>。

1970年5月，內政部長馬塞蘭（Raymond Marcellin）以煽動和危害國家安全罪控告「無產階級左翼」並取締了該組織，同時沒收了《人民事業報》，還先後逮捕了該報的兩名編輯。6月8日，在馬塞蘭的推動下，法國議會通過了一項《反破壞法》（*Loi Anti-casseurs*），要求對所有參與破壞式示威活動的人予以一到五年的監禁<sup>⑪</sup>。之後，毛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洛茨基派等極左人士頻頻被警察逮捕並以此罪名被控訴，創辦的報刊雜誌也因此遭到取締。這些事件引發了法國社會對毛主義者的普遍同情，尤其是一批著名的左翼知識份子均對毛主義者表示支持。薩特（Jean-Paul Sartre）和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原本對文革和毛主義運動持審慎的態度，但為了反抗政府對言論自由的限制，他們組建了「人民事業之友」協會對毛主義者進行聲援。薩特隨後執掌了《人民事業報》，為了表達對政府打壓毛主義者的控訴，還以左拉（Émile Zola）的著名檄文〈我控訴〉——“J'accuse”一詞作為1970年11月復刊後的《人民事業報》的名稱。為了擴大影響，他與波伏娃還一起親自上街宣傳和售賣報紙。

針對警察局頻頻逮捕極左份子並利用國家安全法庭來審判的行為<sup>⑫</sup>，不少對國家機器的權威充滿不信任的知識份子遂起來抗爭。首先是被關押的極左人士在監獄建立了「政治犯組織」，進行了幾次絕食抗議行動，要求獲得公

平的政治地位，讓極左派團體也能夠獲得自由集會、出版等權利。同時，尚未被拘捕的「無產階級左翼」成員向一些著名左翼知識份子尋求幫助，得到福柯 (Michel Foucault)、社會黨律師巴丹戴爾 (Robert Badinter) 等人的聲援<sup>③</sup>。1971年2月8日，福柯與作家讓－馬利·多梅納克 (Jean-Marie Domenach) 以及一些司法工作者一起建立了「監獄信息小組」。他們通過問卷、訪談等方式從政治犯、監獄工作人員和探監家屬那裏獲取關於監獄日常情況的信息，從毛澤東的「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理念出發，以實際的證據來揭露和批判法國的司法和刑事制度，試圖衝破無處不在的權力體系<sup>④</sup>。這一小組代表了知識份子對於自身角色的思考，認為面對權力的日常滲透，佔據特殊地位的知識份子不應拒絕進入權力之網；相反，要進入權力內部進行工作，以「局部知識」與現行權力展開鬥爭<sup>⑤</sup>。

另有一些左翼報刊的記者和編輯也愈來愈關注毛主義運動。像門檻出版社 (Éditions du Seuil) 從1960年起發行的《原樣》(*Tel Quel*，又譯《太凱爾》或《泰凱爾》) 雜誌，其編輯團隊匯聚了一批先鋒派的文化界人士，經常發表一些挑戰社會主流觀念的文章。他們原本與法共有所關聯，但自文革和「五月風暴」發生以後，開始對中國問題感興趣，在1970年代初加入到毛主義運動中。1972年《原樣》刊發了兩期關於中國的特輯，對於毛澤東的政治哲學思想進行評論，並宣傳中國革命，提出了「革命中國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sup>⑥</sup>這兩期的銷量創下了《原樣》創刊以來的歷史新高，賣出了2萬到2.5萬份，年輕學生成為主要的閱讀群體<sup>⑦</sup>。此後，《原樣》經常發表有關中國和毛澤東思想的評論文章，以及詩歌、影評、小說等文學作品。法共文化評論雜誌《新批評》(*La Nouvelle Critique*) 的編輯洛瓦 (Michelle Loi)，因受到這些文章的影響而改變了立場，也轉向了毛主義運動，成為《原樣》的編委會成員<sup>⑧</sup>。

這些左翼知識份子基於對毛主義的嚮往，奉行了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到人民中去了解情況、進行宣傳動員和組織力量，這些積極「介入」大眾生活的做法，得到薩特等介入型知識份子的讚賞。他們的筆墨喚起了法國社會對中國革命文化更多的關注，模糊了階級和政治立場的邊界。介紹中國革命以及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情況的書刊、電影、音樂和小說等文化作品得到廣泛討論，無疑帶動了法國民眾對於中國的興趣和了解，從而在法國出現了「中國熱」。

### (三) 法國左翼對中國的烏托邦式想像

毛主義運動的發展實際反映了法國「光輝三十年」(1945-1975) 的資本主義制度快速恢復和重新繁榮的背後所隱藏的社會危機，即民眾對於國家元首、政府官員、社會精英、資本家等掌握政治、經濟、文化權力的人都失去了信任和崇敬，對於主流的政治思想、理論學說、宗教和社會規範也產生了深刻的懷疑，尤其是尚未獲得權威地位、被長期規訓的年輕人，試圖擺脫這些束縛於己身的枷鎖，讓自己的主張從權勢的壓迫和困苦中釋放，獲得精神上的自由。因而他們起來造反，試圖破壞現行的權威帶來的等級秩序。儘管「五月

風暴」失敗了，但是對於個體自由、民主的追求並未終結。他們從毛澤東思想中發現了理論指引——一位具有非凡品質的革命家、理論家、詩人、國家元首<sup>⑧</sup>，從革命鬥爭實踐中獲得的經驗和理論，自然對於正在摸索如何建立新世界的人們帶有啟示意義。因為一些理念的契合，尤其是「造反有理」的口號帶來的激情，在法國毛主義者心中，毛澤東思想——一種異域東方文明和馬克思主義雜糅後的教義，被塑造為宗教般的啟示錄；而中國也成為東方的烏托邦，充滿了各種理想的狀態，同時又是虛幻縹緲的。

首先，他們對中國的憧憬是基於毛澤東的革命教義對現存權威和制度的挑戰。他們認為中國的革命與建設經驗糾正和修改了蘇聯的錯誤，避免了蘇聯共產主義僵化的官僚體制，建設具有人性化的社會主義。中國的「造反」精神還體現在向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發起挑戰，這對於身處資本主義大眾消費時代，感受到人被極端物化、無法掌控個體自由的民眾來說，是一種精神上的伊甸園，可以淡化物質追求而獲得精神「救贖」<sup>⑨</sup>。另外，中國對美蘇兩極霸權的抗爭，展現了第三世界國家追求國際秩序平等的時代主題，也引發了法國第三世界主義者的共鳴。

其次，中國號召的平等主義被視為一種全面的平等。採用「大字報」的方式來表達言論自由和政治平等，或是毛澤東所言的「婦女能頂半邊天」，展現了對性別、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平等追求。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展現了普遍的民主，一種權力下放、直接民主的方式，是毛主義者孜孜以求的目標<sup>⑩</sup>。

再者，中國人民「愚公移山」的精神也引起了法國毛主義者的欽佩：南京大橋、大寨村、五七幹校等，都是人民意志的展現。這種集體主義和唯意志論展現了「人多好辦事」、「有志者事竟成」的中國式理念，鼓舞了法國毛主義者推翻舊秩序、建立新世界的革命熱情。

總的來說，中國成為了複雜形態的「他者」，每個人眼中的中國也許是不同的，但都是法國左翼對於自身理想抱負的投射。從1930年代崇拜蘇聯到60年代熱議中國革命，法國左翼總是從一個與自身不同的異域來描繪心中的理想國度，並對自身的狀況加以批判。正如一些法國知識份子所述，因為法國是地獄，才顯示出對面的中國是天堂<sup>⑪</sup>。

不過，對中國革命教義的宣傳和臆想在1970年代後期步入衰退。一方面，1974年德斯坦（Valéry G. d'Estaing）入主愛麗舍宮後，極左派最厭惡的「敵人」、內政部長馬塞蘭下台了。新任內政部長不再採用強硬手段對極左思潮進行打壓。當言論自由權利得到保障後，毛主義運動等極左思潮反而退潮了，因為採用「恐怖」、「暴力」等革命手段去抵抗專制權威似乎失去了合法性。另一方面，受到法國國內以及全球性政治氣候的影響，戰後曾長期主導法國思想界、文化界的左翼力量也出現了整體的衰退，對毛澤東思想迷戀、追捧的現象也隨之退潮。

更為關鍵的是，中國發生的猛烈轉變給法國的毛主義者帶來了困惑、迷茫以及分裂。1976年9月9日毛澤東的逝世，意味着一個革命時代的落幕。隨後，法國毛主義運動陷入了四分五裂：一些人堅守毛澤東的革命思想理論，反對中國新領導層對「四人幫」的清算，如《原樣》主編索萊爾斯（Philippe Sollers）



等人就在《世界報》公開發文批判鄧小平的改革路線而支持江青<sup>③</sup>；另一些人在逐步了解文革的事實真相後，感到理想破滅而失望痛苦，如同那些知曉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後批判蘇聯的法共知識份子那樣，反過頭來痛訴中共犯下的錯誤。此外，紅色高棉的反人類罪被揭露，中國與越南這兩個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兵戎相向，都給整個國際共運的形象造成不可磨滅的打擊，原本的一些毛主義者，如歷史學家庫爾圖瓦 (Stéphane Courtois) 成為了共產主義政權的強烈批判者<sup>④</sup>。當中國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重大國策後，法國左翼中又有一批人士反對這種修正主義的做法，而另一群改良主義者卻讚賞和樂見中國走務實道路，建設「四個現代化」<sup>⑤</sup>。

## 四 結論

雖然中國與法國分處亞歐大陸的兩端，遙遠的距離造成了彼此思想文化上的相隔，而冷戰時期兩國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對立，又加劇民眾間的隔閡或誤解，但中法兩國人民的精神和情懷有着共通之處：即對平等主義存在強烈訴求<sup>⑥</sup>。這使得在有限的傳播渠道下，中國的革命文化能與法國的革命文化產生共鳴。

具體來看，中國革命思想在戰後法國社會的傳播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其中不同角色的宣傳目的是不一樣的。法共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宣傳，主要是為了宣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普世性和國際共運力量的壯大，有助於加強法共自身的凝聚力和威望。在法共中央看來，中國從農業社會直接改造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對於法國本身的借鑒意義不大，主要是對第三世界有啟示作用，因而在學習或宣傳時更多是出於政治目的或履行國際主義原則。法共內部的親華左派人士對於中國革命思想及理論刊物的學習和宣傳，則反映了他們對中國理論的實際需要：或是為遵循正統馬列主義思想尋求外部支持；或是滿足自身參與第三世界革命的渴望，同時也帶有配合中共擴大世界革命、反擊修正主義的宣傳需要。事實上，這部分左派人士人數有限，意味着戰後法國秉持正統馬列主義革命路線的支持者已經極少。那為何在19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會對法國社會產生不小的影響呢？這其實與當時中國在法國的宣傳主題被解讀為反抗權威有關，毛主義者或者更為廣泛的知識群體，試圖以中國的「群眾路線」和「造反有理」思想來反抗既有的權威秩序、爭取普遍的民主和平等。他們依據自身需要，臆想出一個烏托邦的中國，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存在着誤解，但卻使得中國革命思想得到傳播和發展。

總體說來，冷戰時期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能夠對法國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主要受到三個方面的推動。首先，傳播的過程不可避免地受到風雲變幻的國際政治局勢的影響。從冷戰兩大陣營的對抗到陣營內部出現分化以及第三世界的壯大，形成了多極化的格局轉向，這種國際力量的嬗變過程展現了中國與法國對戰後兩極格局和美蘇霸權的挑戰，從而改善了中法兩國關係、

削弱了中共與法共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聯繫，使得中國的理論思想能夠通過擴大的文化交流而直接地觸及法國社會。

其次，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法國的傳播情況順應了戰後法國整體左傾的政治思想氛圍，尤其在知識界和文化界，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薩特一系的激進主義長期佔據上風<sup>②</sup>。與此同時，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所扮演的抗衡霸權國家、扶持弱小國家的角色與追求，以及自身所展現的不斷努力奮進的新興社會主義大國的形象，都契合了法國左翼所關注的時代主題：去殖民化運動、第三世界的發展、反對霸權主義，等等。

再次，不論法共還是毛主義者或左翼知識份子，都是根據自身的需求和情況來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進行解讀的，與中國的實情存在差異；毛主義也與毛澤東思想並不一致。他們對於中國懷着烏托邦式的想像，實際是從中感受到了自身政治文化中所追求的平等主義和人道主義，因此他們的解讀與宣傳都帶有深深的法國式烙印。

這些因素造成了中國革命思想傳入法國的嬗變過程，塑造了新中國的形象：一個經濟落後、物質貧窮的國度，但民眾的精神文化積極向上，在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道路上奮發前進，展現出人民的集體力量。中國的革命精神不僅成為第三世界的榜樣，對於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產生作用，也能給物質豐富但精神疲弱的西方國家帶來新的文化政治風氣，幫助他們反抗權威力量，促進普遍的民主。在這樣的解讀下，儘管法中兩國社會發展階段不同，但中國革命思想的魅力吸引着法國左翼，從而在法國經濟高速發展、消費主義盛行、精英政治文化已無法滿足大眾需要的階段，出現了一股「中國熱」，使得革命思想形成回流，並與法國反權威、促平等的精神結合在一起。值得指出的一個弔詭現象是：當部分法國左翼知識青年對中國革命領袖頂禮膜拜之時，他們追求的實際是廣泛的政治文化的民主。

## 註釋

① 高毅：〈法國革命文化與20世紀初中國革命崇拜的確立〉，《歷史教學問題》，2000年第1期，頁15-20。

②③ 高毅：〈法國革命文化與現代中國革命〉，《浙江學刊》，2006年第4期，頁76-81。

③ 參見 Christophe Bourseiller, *Les maoïstes: la folle histoire des gardes rouges français* (Paris: Points, 2008); François Hourmant, *Les Années Mao en France: Avant, pendant et après mai 68* (Paris: Odile Jacob, 2018); 沃林(Richard Wolin)著，董樹寶譯：《東風：法國知識份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

④ 參見藤凌、涂玉平：〈法國五月風暴與法共、毛派和托派〉，《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1年第2期，頁73-79；萬家星：〈中國「文革」與法國「五月風暴」評論〉，《學術界》，2001年第5期，頁55-67；武小凱：〈對官僚制的反抗——以法國五月風暴和中國紅衛兵運動成為切入點〉，《南方論刊》，2010年第4期，頁60-62，等等。

- ⑤ 有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比較和解析，參見張國鏞：〈「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比較〉，《探索》，2007年第2期，頁8-12；田克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7年第1期，頁15-19等。
- ⑥ 參見Stéphane Courtois and Marc Lazar, *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Paris: PUF, 2000), 257-60, 267-71。
- ⑦ 劉寧一：《歷史回憶》（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6），頁93。
- ⑧ “Rapport sur la situation en Chine” (14 February 1947), APCF (法國共產黨檔案), 273 J 3-4. 法共檔案卷宗內未標頁碼，下同。
- ⑨ “Rapport de Marius Magnien sur la Chine” (5 February 1947), APCF, 273 J 10.
- ⑩ “Avance victorieuse des forces démocratiques chinoises”, *L'Humanité*, 6 May 1947.
- ⑪ Marcel Cachin, “Tchang Kai Chek aux abois!”, *L'Humanité*, 28 May 1947.
- ⑫ Marcel Cachin, “De la Méditerranée au Pacifique”, *L'Humanité*, 12 September 1947.
- ⑬ Marcel Cachin, “Le parti de la guerre”, *L'Humanité*, 24 October 1947.
- ⑭ 參見法國國家圖書館網絡資源庫Gallica的《人道報》資源，<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cb327877302/date&rk=128756;0>。
- ⑮ “Rapport de Marius Magnien sur la situation en Chine” (20 October 1948), APCF, 273 J 3-4.
- ⑯ Pierre Courtade, “La lutte des peuples de l'Asie”, *L'Humanité*, 4 September 1948.
- ⑰ Pierre Courtade, “Une grande victoire”, *L'Humanité*, 1 November 1948.
- ⑱ “Résolution du Comité Central d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L'Humanité*, 17 November 1948.
- ⑲ “Réunion du secrétariat du 2 août 1949”, APCF, 2 Num\_4/8.
- ⑳ “Réunion de la Commission de politique extérieure” (23 November 1949), APCF, 273 J 3-4.
- ㉑ Mao Tsé Toung, “La dictature de la démocratie populaire”, *L'Humanité*, 21 July 1949.
- ㉒ “Nos seuls ennemis sont les réactionnaires de l'intérieur et de l'étranger, déclare Mao Tsé Toung à l'occasion du 28e anniversaire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L'Humanité*, 2 July 1949.
- ㉓ Georges Cogniot, “Une victoire stalinienne”, *Démocratie Nouvelle*, numéro spécial (June 1950): 297-302.
- ㉔ “La Chine et le Viet-Nam combattent ensemble sur le front de la lutte anti-impérialiste”, *L'Humanité*, 26 November 1949; Pierre Courtade, “Des mercenaires de Tchang Kai Chek en déroute sont entrés hier en Indochine avec la complicité des autorités françaises”, *L'Humanité*, 15 December 1949.
- ㉕ “Comme un volcan”, *L'Humanité*, 18 April 1948.
- ㉖ “De la Chine démocratique des millions d'adhésions au Congrès mondial des Partisans de la Paix”, *L'Humanité*, 25 March 1950.
- ㉗ 〈來華主持亞澳工會會議 賽揚等過瀋來京〉，《人民日報》，1949年11月15日，第1版；〈參加亞洲婦女代表會議 國際民主婦聯總書記古久里夫人抵京〉，《人民日報》，1949年12月5日，第1版。
- ㉘ Jeannette Vermeersch, “A la découverte de la Chine nouvelle: la terre à celui qui la travaille”, *L'Humanité*, 30 January 1950.
- ㉙ Jeannette Vermeersch, “A la découverte de la Chine nouvelle: VII. Le chemin du bonheur est ouvert”, *L'Humanité*, 4 February 1950.
- ㉚ Marius Magnien, “Je reviens de Chine: Comment vit l'ouvrier chinois”, *L'Humanité*, 4 December 1950.

- ③① Marius Magnien, "Je reviens de Chine: A travers les riches provinces du Sud", *L'Humanité*, 6 December 1950.
- ③② Marius Magnien, "Je reviens de Chine: Au service du peuple, vers le socialisme", *L'Humanité*, 11 December 1950.
- ③③ 〈法友人馬尼安談法共情況〉(1956年7月10日),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以下簡稱「外檔」), 110-00596-03, 頁1-3。
- ③④ "La déclaration du Bureau Politique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sur l'internationalisme prolétarien", *L'Humanité*, 30 December 1956.
- ③⑤ 〈法友對「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反應〉(1957年1月5日), 外檔, 110-00667-03, 頁1。
- ③⑥ "Compte-rendu public de Raymond Guyot du 8e Congrès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October 1956), APCF, 283 J 26.
- ③⑦ 〈法友馬尼安來談對波匈事件的看法〉(1956年11月3日), 外檔, 110-00596-05, 頁1-3。
- ③⑧ "La production d'acier doublera cette année en Chine", *L'Humanité*, 3 September 1958.
- ③⑨⑦ 參見習少穎:《1949-1966年中國對外宣傳史研究》(武漢:華科技大學出版社, 2010), 頁82-85; 20、39。
- ④⑩ "Commission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Séance du mercredi 10 juillet 1957", AN (法國國家檔案館), C//15750, 7-11; Conseil de la République, no. 128, "la séance du 19 décembre 1957: Proposition de résolution tendant à inviter le Gouvernement à reconnaîtr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AMAE (法國外交部檔案館), 119QO/520, 72-75.
- ④⑪ 〈法資產階級輿論要求承認我國的反應〉(1954年2月10日), 外檔, 110-00258-10, 頁79-80。
- ④⑫ "Les décisions du Secrétariat du 5 décembre 1961", APCF, 2 Num\_4/12.
- ④⑬ 〈法共情況一月(一)〉(1960年9月3日), 外檔, 110-00994-01, 頁24-27。
- ④⑭ 〈一些法共黨員思想情況〉(1963年1月31日), 外檔, 110-01620-03, 頁6-9。
- ④⑮ 〈一批法共黨員情況〉(1963年10月14日), 外檔, 110-01620-01, 頁6-8。
- ④⑯ 〈關於法國共產黨和左派內部有關情況〉(1963年3月16日至11月25日), 外檔, 110-01620-01, 頁1-25。
- ④⑰ 〈對西歐馬列主義左派工作總結〉(1963年9月15日), 外檔, 110-01549-02, 頁1-15。
- ④⑱ 馬爾梯1926年加入法共, 參加過抵抗運動。他批評去斯大林化, 從1963年夏天起, 在法共黨內組織親華小團體「了解中國委員會」。參見〈法共左派馬爾梯來訪情況〉(1963年11月5日), 外檔, 110-01620-01, 頁12-16。
- ④⑲ 儒爾蓋1941年底加入法共。二戰時加入法蘭西第一軍, 認識了不少來自北非的士兵。他不滿法共的阿爾及利亞政策, 積極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中蘇論戰後, 他被中國的革命理論吸引, 1962年加入法中友好協會馬賽分會。
- ④⑳ 貝熱隆曾在《人道報》任編輯。1959年受邀在北京外文出版社擔任顧問、法文編審, 為《中國建設》、《中國畫報》等期刊法文版改定稿, 在中國居住到1961年。回到巴黎後任法共屬下的週報《新法蘭西》(*France Nouvelle*)的副總編。1962年9月底為慶祝中國國慶, 他在《新法蘭西》上刊登支持中國的文章〈建國十四周年即將來臨〉, 遭到黨內批評而與編輯部決裂。
- ⑤① "Note pour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relations culturelles avec la Chine Continentale" (22 July 1963), AMAE, 119QO/462.
- ⑤② "Télégramme de Pékin à Paris (N° 695)" (18 August 1964), AMAE, 119QO/463.
- ⑤③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Diffusion publicitaire projetée par l'Association des Amitié Franco-Chinoises" (28 February 1964), AMAE, 119QO/462.



- ⑤④ “Réunion du Bureau du 27 janvier 1964”, BDIC (法國當代國際文獻圖書館), F delta res 0613/12.
- ⑤⑤ “Procès-verbaux des réunions de la Fédération des Cercles M.L.” (15 February 1964), BDIC, F delta res 0613/12.
- ⑤⑥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la diffusion de la presse chinoise en France” (18 December 1964), AMAE, 119QO/528. 法國政府統計的只是通過正規渠道進入法國的刊物，不包括私人攜帶或中方駐法機構贈與等情況。
- ⑤⑦ 〈法「聯合會」聯席會議的情況〉(1965年2月10日)，外檔，110-01892-01，頁53-55。
- ⑤⑧ 〈法國共產主義運動(馬列主義)首次代表大會致電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讚揚毛主席對反修鬥爭作出歷史性貢獻〉，《人民日報》，1966年7月23日，第5版。
- ⑤⑨ 〈法國《新人道報》發表文章強調指出 馬列主義者應從中國文化大革命吸取教益〉，《人民日報》，1966年10月17日，第4版。
- ⑥① “Point essentiels traités lors de l’audience du Général de Gaulle à l’Ambassadeur de Chine, M. Huang Chen, à l’Elysée le 19 juin 1964”, AMAE, 119QO/527, 155-58.
- ⑥② “Entretien de M. André Malraux avec M. Chou En-Lai au Palais du Peuple à Pékin le 2 août 1965”, AMAE, 119QO/532, 89.
- ⑥③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à Monsieur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iffusion publicitaire projetée par l’Association des Amitiés franco-chinoises” (3 March 1964), AMAE, 119QO/462, 109.
- ⑥④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 Contrôle de la presse étrangère à l’importation. Au sujet de la publication intitulée ‘La Chine en construction’ ” (19 July 1965), AMAE, 119QO/531, 123.
- ⑥⑤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iffusion de ‘La Chine en construction’ ” (13 December 1965), AMAE, 119QO/531.
- ⑥⑥ “Direction des Affaires Politiques Asie-Océanie: Les incidences d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chinoise à Paris” (22 February 1967), AMAE, 119QO/538, 10-15.
- ⑥⑦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à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Indice de propagande politique de la Chine populaire dans le département de la Sarthe” (3 February 1967), AMAE, 119QO/536, 112-13; “Note pour la Direction des Affaires Politiques: M. Chiu Yee” (26 July 1967), AMAE, 119QO/537, 41-43.
- ⑥⑧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à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Diffusion de la presse communiste chinoise” (26 April 1967), AMAE, 119QO/537, 166;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à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Diffusion de la presse importée de Chine Populaire” (28 June 1967), AMAE, 119QO/537, 168.
- ⑥⑨ “Direction des Affaires Politiques Asie-Océanie: Demande d’autorisation de fonctionner présentée par une association chinoise” (3 June 1967), AMAE, 119QO/536, 230-31.
- ⑦⑩ “Note pour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Publications chinoises” (11 July 1966), AMAE, 119QO/533, 186-88.
- ⑦⑪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iffusion de publications chinoises en France” (10 July 1967), AMAE, 119QO/537, 28-29.
- ⑦⑫ 阿爾都塞1918年生於阿爾及利亞，二戰後在巴黎高師學習並留校任教。1948年加入法共。1960年代中期起，他用結構主義觀點解釋馬克思主義，是法國著名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者」。林哈特生於1944年，1963年秋天進入巴黎高師學習。1964年加入共產主義學生聯盟，後脫離並建立共產主義青年聯盟(馬列主義)。
- ⑦⑬⑭⑮ Christophe Bourseiller, *Les maoïstes*, 84; 118-19; 89-90.

- ⑦④ 潘鳴嘯 (Michel Bonnin) 著，歐陽因譯：《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 1968-1980》(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頁 426。
- ⑦⑤ “La gauche française et les problèmes internationaux”，*Le Monde*, 1 July 1967.
- ⑦⑥ Jean Baby, “Défense et illustration d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I—De la circulaire du 16 mai 1966 à la décision du 8 août”，*Le Monde*, 31 October 1967; “II—Les moteurs de la révolution”，*Le Monde*, 1 November 1967.
- ⑦⑦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iffusion de publications chinoises en France” (19 August 1968), AMAE, 119QO/748.
- ⑦⑧ 《人民事業報》由前共青聯(馬列)成員卡斯特羅(Roland Castro)於1968年5月1日創辦，時名《為人民服務》(*Servir le peuple*)。共青聯(馬列)被取締後，卡斯特羅加入了10月建立的「共產主義萬歲」(*Vive le communisme*)。《為人民服務》由卡斯特羅的好友、同為前共青聯(馬列)成員的勒當泰克擔任新主編，改名為《人民事業報》，後者加入「無產階級左翼」，《人民事業報》從而成為該組織的機關報。
- ⑦⑨ “Loi n°70-480 du 8 juin 1970”，*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9 June 1970, 5324.
- ⑦⑩ 國家安全法庭建立於1963年，最初是為了審判阿爾及利亞戰爭中的極右秘密軍隊組織成員而設立的，之後負責對危害國家安全的間諜或恐怖份子的司法判決。「五月風暴」以後，它主要針對極左份子進行審判。1981年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上台後廢除了該法庭。
- ⑦⑪ Jean-Philippe Catonné, “Michel Foucault et la prison”，*Pratiques en santé mentale*, no. 4 (2018): 47-51.
- ⑦⑫ 沃林：《東風》，頁361。
- ⑦⑬ 這與福柯等人的知識份子觀念有關，參見呂一民、朱曉罕：《良知與擔當：20世紀法國知識份子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頁257-59。
- ⑦⑭ “Chine”，*Tel Quel*, no. 48-49 (spring 1972); “Chine 2”，*Tel Quel*, no. 50 (summer 1972).
- ⑦⑮ Niilo Kauppi, *Tel Quel, la constitution sociale d’une avant-garde* (Helsinki: Societas Scientiarum Fennica, 1990), 231.
- ⑦⑯ François Hourmant, *Le désenchantement des clercs, Figures de l’intellectuel dans l’après-Mai 68*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5), 36.
- ⑦⑰ Michelle Loi, *L’Intelligence au pouvoir. Un monde nouveau: la Chine*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1973), 147.
- ⑦⑱ François Hourmant, “De Lénine à Marcos: modèles étrangers pour la Gauche?”，in *Histoire des Gauches en France*, vol. 2, ed. Jean-Jacques Becker and Gilles Candar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5), 477.
- ⑦⑲ Philippe Gavi, Jean-Paul Sartre, and Pierre Victor, *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 discussions* (Paris: Gallimard, 1974), 16.
- ⑦⑳ Philippe Nemo, “Chine: envers de notre enfer”，*Combat*, 10 September 1971.
- ㉑ “Qu’est devenu l’idéal de démocratie prolétarienne?”，*Le Monde*, 20 November 1976.
- ㉒ Stéphane Courtois et al.,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 répression* (Paris: Robert Laffont, 1997).
- ㉓ Bianco Lucien, “La Chine à la française”，*Matériaux pour l’Histoire de notre temps*, no. 9 (1987): 36-40.
- ㉔ 呂一民、朱曉罕：《良知與擔當》，頁139、270-71。